

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与宗教研究述评

金少萍 徐伟兵

提 要：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隐含着人类历史的文化基因。男女两性共同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文化。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视角下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起，学术界对宗教的研究也开拓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学术旨趣，如女性与宗教这一新动向的出现。云南民族众多，由于其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的不均衡性，其宗教类型齐全，信仰内涵丰富。在此背景下，本文拟对近些年来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与宗教的相关研究情况，分别作一宗教人类学理论视角下的概述。

金少萍，女，1957年生，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徐伟兵，男，1980年生，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2006级人类学硕士研究生。

主题词：云南少数民族 女性 宗教 人类学

一、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与原始崇拜的研究

原始崇拜所具有的主要形态包括：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等。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着文化，承担着生活，女性在生产、生活中也担负了许多的工作和责任。其中，由于女性的生殖繁衍能力，在原始崇拜中大量存在着先民对母体乃至女神崇拜的遗迹。

1、对女性与自然崇拜的研究

《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羌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卷）》（吕大吉、和志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彝族、白族、基诺族卷）》（吕大吉、何耀华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纳西族、羌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卷）》（吕大吉、何耀华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以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整理、学术资料采编、实地调查为手段，对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的内容、形式做出了细致记录和描述，是颇有份量的几部著作。其中收录有不少女性与自然崇拜（山、地、水、植物等）的相关资料。

这几部著作尽量保持客观记录，在文本上隐去作者的立场态度而鲜有阐释。这为后来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除此外，一些著作也从不同角度对原始崇拜做了类似的概貌性陈述，如《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李德成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世纪之交的民族宗教——云南少数民族宗教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缪家福、张庆和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国水崇拜》（向阳松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云南原始宗教》（杨学政、袁跃萍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等等。这些著作不仅限于对自然崇拜的描述，也包含了对原始崇拜中其他方面内容的阐述，一并体现在本综述的其他内容中。

某些论文则具体探讨了自然崇拜中某一方面信仰的内容，“白族本主神话中的水神崇拜”（李晓莉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3期），通过对本主神话中与水相关的故事来解读自然崇拜中的水神信仰。其中存在着很多或人或神的女性人物。

2、对女性生殖崇拜的研究

生殖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特殊形态。在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遗迹和信仰祭祀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这一历史特征。正如上文所表明的，女性生殖崇拜暗含在自然崇拜之中，这在与某些自然实物的关联中便可窥见。崇拜对象背后崇拜信念的一致性，使得女性生殖崇拜成为大多学者解读原始崇拜中女性地位的重要研究主题。

如《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里记载的：中甸白地的纳西族拜石壁（状似女阴）以求子^①；鹤庆黄坪乡黄坪村后山崖壁上状如女性生殖器的大石凹，当地鹤庆白族称为“石母家什”，对此虔诚不止^②；每年农历7月27日到8月1日，剑川和鹤庆县及洱海区域的青年男女参加传统的石宝山歌会，并对“阿央白”跪拜，以求生育顺利，多子多福。

对这一丰富庞杂的生殖崇拜主题，近年的学术期刊也颇有论述。在“彝族生殖文化概论”（杨甫旺载《楚

雄师专学报》1999年2期)一文中,作者认为生殖崇拜先后经历了图腾生殖崇拜、女阴崇拜、男根崇拜、性行为崇拜、生育神崇拜等几个阶段。而图腾生殖崇拜、女阴崇拜(原始洪水神话中的“葫芦”象征、葫芦崇拜、洞穴崇拜、祭“密枝林”)、生育神崇拜(西王母、观音娘娘)都是以女性生殖为主体的。不管这样的划分是否合理,但是女性生殖崇拜作为原始崇拜的重要形式,确实存在于原始社会中,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彝族树崇拜与生殖文化”(杨甫旺、马胤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1期)、“彝族竹崇拜与生殖文化初探”(杨甫旺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2期)两篇文章中,通过对彝族社会的神话传说和植物(树、竹)崇拜,阐述了植物(树、竹)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具有繁衍后代的意义,之后伴随着父系社会的确立才演变为男根的象征。文章以历时性角度,对植物(树、竹)崇拜的研究,印证了彝族社会原始性崇拜内容的先后秩序。

“佧族木鼓崇拜的文化内涵”(杨洪载《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2期)通过对木鼓传说的考证和木鼓实体的细致描写,阐述了佧族木鼓崇拜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女性生殖崇拜。是先民对原始生育秘密的探索,文章认为,这样的探索经历了由女性自身生育,男性种子生育进而到男女结合生育的过程。

“联想与类比: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性象征”(李金莲载《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1期),从象征的角度分析了纳西族社会原始崇拜中存在的性象征,正如题目所言,这样的性象征是以联想与类比为思维基础的。对女性生殖的崇拜主要体现在自然的山、水、峡谷,动物中的鱼、蛙、海螺,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火塘。与上文所述类似,女性生殖崇拜的产生先于男根的崇拜,之后或与男根崇拜并存,而最终到达对两性的崇拜。

可以说,以上的几篇论文,都是对生殖崇拜历史过程的构建和印证。即生殖崇拜是一个女阴崇拜——男根崇拜——两性崇拜的过程。个别文章也对原始崇拜的功能与现实意义的关联做出了尝试性地探讨。“试析拉祜族原始宗教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姜颖载《思想战线》2001年5期),阐述了拉祜族的原始宗教与现实社会发展中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作者认为对祖先“厄莎”的崇拜是拉祜族原始崇拜的核心。再有,因为“‘太阳是女人’,是造物主‘厄莎’的女儿”,所以他们也把土地、大树、山称为“俄玛(女性、母性)”。由此可见其观念中具有男女平等的思想,抚养的子女,不论男女,都具有财产继承权。这样的思想无异是朴素而深刻的。

3、对女神崇拜的研究

女神崇拜作为原始崇拜中的重要内容,从崇拜对象上来说应该是对人格化的祖先灵魂的崇拜。因当时社会关系的制约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在云南

少数民族中曾出现过不少女性村社神。

基诺族最古老的村寨都以妇女为祖先,如司土寨的女祖先“未里几德”,她最先定居的寨子被称为“阿普夏勒米古”(即女人管理的祖根根的寨子)^⑤;阿哈部落的女祖先名叫门普少得,“门普”是地名,“少得”是没有父亲的女子“得”,她同样因为对本寨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被尊为女祖,成为村寨的守护神。^④

白族的“本主”信仰中有不少女“本主”,如大理北门外崇祀的柏洁圣妃,大理高兴村的玄德圣母,挖色街的裕后圣母,洱源县上集村的金角娘娘,鹤庆县上登村的龙女三娘等等,^⑥路南撒尼彝族的“密支”神就是社神(村寨保护神)。根据《普兹楠兹》的内容,普、楠二神就是祖先神的男女代表,密支林里的神树和鹤卵石则代表原始山神。二者构成了“社神”——村寨保护神;^⑦布朗族对古老氏族长“代袜么”(女性祖先)和“代袜那”(男性祖先)的崇拜,这两位氏族祖先成为各村共同的崇拜对象——寨神(“丢那曼”);哈尼族的护寨神“艾玛”,作为生育万神之神,对她的祭祀是隆重的宗教祭典“艾玛突”。

与上述女性村社神一致的女神崇拜,是在以母亲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中,女性因为承担了人类的繁衍,成为人类的始祖、扮演着人类的保护神。女神既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创世者,一个民族的生育者,也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保护者。因此对女神的崇拜大多停留在民族的记忆中,留下了现实的印记。前人研究提及的大致有以下几类:

(1) 创世女神:壮族的始祖女神叫姆六甲,因为传说她是由99朵鲜花聚拢而成,被称为“花婆”。在人类混沌的时代,她创造了天地万物。成为了人类(壮族)的开始祖母和生育女神^⑧;基诺族的女始祖阿嫫腰白,她创造了天地,用手搓出了污垢做成了人和动物,并把人分成了汉族、傣族和基诺族。^⑨

(2) 生育女神:永宁纳西族虔诚信仰生育女神——“那踟”,它主宰妇女的生育并保佑婴儿的健康。^⑩丽江鲁甸地区和中甸三坝地区对生育神“仁”的祭祀仪式。但是,这两个地区祭祀的对象并没有具体的偶像;基诺族的新生命由一位叫丕嫫的女神创造;佧族祭祀木鼓,认为木鼓房里住的是掌管谷物生长的女神司欧布。

(3) 女祖先神:摩梭人对女神“巴丁喇木”的崇拜,是以当地一尊酷似女性的钟乳石为对象。根据民间流传的神话,“巴丁喇木”是当地摩梭人、普米族和藏族共同的女始祖;^⑪永宁坝和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还信奉“格姆”女神,其具体的化身便是“格姆山”。在永宁干木山对“格姆女神”的祭祀活动是每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干木石”,即“转海”活动。

(4) 女英雄:在弥勒阿细彝族的密支节,相传古时,有个名叫“米德摩”的女英雄战胜了危害人类的恶

神。人们以此纪念她，乞求她保护村寨人畜平安。^①

对以上内容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崇拜中，崇拜对象是丰富多样的。同时，在原始社会由于人们日常生活主要受到自然力量和社会关系的制约，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构成了原始崇拜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的崇拜对象，其他的崇拜对象大体上均由此衍化而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对“非人格化的图腾祖先灵、自然灵力、人格化的祖先灵、自然精灵”^②等表现形式的超“自然力”崇拜对象的信仰中，对女性主体的崇拜显然是主要的。同时，这样的崇拜信念是基于人类母系氏族社会的存在过程中，对女性生育能力的崇拜，是对“种”的繁衍和对人自身再创造的一种信仰和祈求。原始崇拜以自然实物（如石头、树木、水等等）为中介和工具，通过祭祀仪式和巫术仪式为崇拜方式展现出其广泛性的存在。表现在当代的学术旨趣上，便是不再满足于对原始崇拜的单纯记录、描写，更多的是专注于对其内容的阐释，尤其是伴随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的兴起，许多女性学者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研究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学术研究中性别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多的强调，这也推进了在宗教文化的研究中对社会性别建构的关注。

方铁主编的《传统文化与生育健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收录的一些文章如“传统文化与白族妇女的生育健康”、“造型艺术反映的生殖信仰与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天赋使命中的感悟与探索——佤族妇女传统生育文化调查研究”等，将妇女生育健康与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崇拜连接起来，推进了研究的深度。赵捷主编的《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和郑凡主编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生育健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则更进一步显示出研究的现实性。

“佤族女性生殖崇拜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文华、杨国才主编《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通过对佤族神话中的“司岗里”传说、木鼓传说、历史遗迹、民居建筑的解读与考察，阐述了佤族社会生殖崇拜的象征对其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宗教生活中的傣族妇女角色”（伍琼华同上）一文则通过对傣族社会宗教节日的剖析，论证了宗教与女性的相互影响和正反面作用；“纳西族自然神的女性原型”（习煜华同上），分析了纳西族自然神“署”的象征意义、基本特征和变形特征，表明了这一自然神的女性原型。这些研究所做的尝试，侧重于宗教文化中社会性别的建构，注重对女性身份主体的强调与认同。

另一方面，原始信仰的持久性存在与民间宗教、人为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傣族原始宗教研究的一个视点——傣族女性与原始宗教”（金少萍载《中央民

族大学学报》2000年3期），则通过对傣族原始宗教信仰中女性神灵的深入挖掘，分析了在傣族原始宗教寨神、勐神崇拜中“神圣”与“世俗”的关联性。作者通过一个独特的视点，阐述了宗教信仰中，男女不可或缺，平等共处的思想。通过人类学视角下神圣与世俗的关联性分析，有力地阐述了傣族现实信仰中对女性矛盾态度背后的内涵，表现出了从研究视角上对原始崇拜中的女性身份表示关注的敏锐度和深入性。这一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对宗教信仰中女性所处地位的关注，表明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性别视角的必要性，如此对原始崇拜的阐释方显全面、客观与平等。从学术角度而言，对原始崇拜的研究亦不致陷入一种困境。

二、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与民间宗教及人为宗教的研究

民间宗教是相对原始宗教与人为宗教而言的，它为单一的民族所创造和信仰。一般而言，其与原始宗教紧密相连，是在逐步吸收一些外民族宗教思想并加工改造后形成的本民族较系统化的信仰，又是向人为宗教过渡的宗教形态。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全民信仰的如纳西族的东巴教、白族的本主崇拜，还有傣族的民间信仰都反映和体现了民间宗教的重要性。同时，因为民间宗教与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紧密连接、互相影响和融汇吸收，在讨论云南某些少数民族的民间宗教信仰时，也无法将其与两者截然地割裂开来。

1、对少数民族女性与民间宗教的研究

（1）对白族女性与本主崇拜的研究

近年来，伴随“白族学”研究的日趋升温，白族“本土崇拜”的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关注，其中不乏性别视角下的观察研究。

“大理白族妇女宗教信仰分析”，（许玉平载《大理学院学报》2004年2期）通过对白族妇女信仰的原始宗教、本主崇拜、道教和佛教的相关分析，指出了在各种信仰中的教义、仪式和禁忌中体现的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

白族本主崇拜中的“莲池会”（“妈妈会”）作为民间信仰的妇女组织，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和密切关注，如：“兰坪县金顶镇白族民间宗教信仰调查”（赵慧生载《宗教学研究》2005年1期）论述了当地白族的信教主体、神职人员、宗教经典和宗教节庆。其中神职人员主要是以“妈妈会”为组织，而宗教节（会）也大部分与这些神职人员相关；“白族村落中的莲池会”（张明曾）、“白族莲池会查访录”（段斌）（载林超民、杨政业、赵寅松主编《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民族出版社2006年）两篇文章都对“莲池会”这一以妇女为主体的白族民间宗教组织做出了考察分析。前者描述了大理市几个村落“莲池会”的历史、团体组

织、活动情况和经文，并分析了“莲池会”的社会功能，强调了女性的重大作用。后者则对洱源县邓川一带的“莲池会”进行了深入调查，详细论述了其产生、发展与流变，以及其经文与仪轨。并具体分析了这一组织的特点、价值意义，尤其反映了该地白族女性的开朗豁达的性格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众神庇佑——白族中老年女性宗教群体‘妈妈会’研究”（王萍 云南大学2005级民族学硕士论文）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这一组织的历史由来、实际功能等进行了深入考察，进而对宗教与妇女身份的关联性进行了解释。

“白族妇女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赵静 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6期）一文讨论了“莲池会”这一主要由白族妇女组成的民间信仰组织所具有的宗教功能和心理慰藉功能、凝聚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和养老辅助功能等社会功能。

“宗教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建构——白族女性与本主崇拜”（金少萍 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1期）以社会性别建构为理论导向，分析阐述了白族本主崇拜中的女性神灵及作为本主崇拜中祭祀主体的女性，并提出了对宗教文化分析研究时应应对男女两性全面关注的理论志向。

（2）对纳西族女性与东巴教的研究

1991年—1995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巴文化丛书》（十册），对东巴文化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包括东巴经典、仪式、祭司、舞蹈以及东巴文化中体现出的生命观和哲学观。其中，原始阴阳观的产生，是从男、女生殖器及其功能或从“公、母”现象抽象而得的。（李国文 著《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一观念与纳西族整个的宇宙观、人生观有极大的关联，也深刻的影响着纳西族人民的现实生活。

“纳西族文化中的女性意识”（蔡维琰 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5期）通过对纳西族文化中的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的分析描述，表明了纳西族女性的独立意识以及在家庭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对纳西族东巴教中女性身份的探讨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氛围。毋庸置疑的是，东巴教中所内含的阴阳观和体现出来的伦理思想，平衡了纳西族社会中的男女地位。

（3）对傣族女性与民间宗教的研究

傣族在云南省境内分布广泛，关于其宗教信仰过去曾一度认为是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对于这一看法，现在已经扭转，认为傣族同时信仰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⑤而对于傣族民间宗教的提法并不多见，更多的看法趋向于以原始宗教作为傣族社会信仰的其中一个主体。因此，对于傣族社会中存在的宗教信仰，大多

是从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这两种类型展开讨论的，并集中于讨论哪一种宗教信仰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至于女性在这两种信仰中具体的身份角色，论述并不多见。

2、对少数民族女性与人为宗教的研究

上述论及的白族本主崇拜、纳西族东巴教、傣族民间宗教，除了纳西族东巴教被大部分学者公认为是一种民间宗教外，其他两者并没有被承认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民间宗教。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上三种宗教信仰都吸收了外来的宗教思想，或者为自己固有的信仰所认同，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着。东巴教就曾与苯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及道教发生交融；白族的本主崇拜与佛教密宗关系紧密；傣族的原始崇拜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互为共存。为照应上文，以下就白族女性与佛教密宗，傣族女性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相关研究作一论述。

（1）对白族女性与佛教密宗的研究

“阿吒力”教是具有大理地方特点的“白密”的一个专有名称。前人的研究指出，在大理白族密宗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高僧。结合大理白族地区自身的信仰，祭祀的神或者高僧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与白族本土原始信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兼容性，尤其是男女两性的共存。如：在白族地区的本主崇拜中，大黑天神（梵语为“摩珂迦逻”）演变为一个地方或一个村寨的保护神，甚至是本主庙的一个配神。有的地方甚至将大黑天神的形象改造成文臣模样，并在其身边塑一位美丽的妻子。如在云龙县顺荡井、松水等村的大黑天神就有三位妻子；白族除了供奉男身观音——观音老爹外，也供奉女身观音。^⑥

也因为大理白族密宗的即身成佛与禳灾祈福的宗旨，体现出一种功利性。这一功利性特征，在白族密宗的形成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现今主要的表现为当地的民间宗教组织——莲池会（妈妈会）的兴盛。莲池会等组织的兴盛便是本主崇拜与“阿吒力”派（白密）结合的载体。

“剑川石窟与白族的信仰民俗”（李东红 载《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3期）对白族社会的石窟崇拜和信仰作出了新的阐释，认为诸如求子、祈雨、朝山、拜观音等以女性为主体的信仰民俗，皆来自于佛教的信仰传统而非原始崇拜。

（2）对傣族女性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

“变动中的宗教——当代西双版纳傣族宗教生活世俗化的特点”（瞿明安 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1期）主要对傣族社会中信教群众与神职人员这两个群体的宗教生活进行了讨论，指出傣族社会宗教生活世俗化的趋势。其中，赧佛等宗教活动，主要是由老年人和中年妇女为主体，中年妇女还积极协助家中老人开展一些佛事

活动。作者将这一群体视为傣族宗教生活世俗化的一个例证,可见妇女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社会形态演化与傣族佛教文化传承”(赵世林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5期)将傣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相联系。认为在傣族社会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南传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虽然较多地保留了母权制的残余,但父权制的确立已无法避免。因此,在世俗领域和神圣领域,女性之地位皆让渡于男权。在宗教意识中,妇女只能分享感情形式,而宗教学说、教义和教理几乎为男性独据。在佛事活动中,妇女是祭祀的主体,但男性掌握着祭祀权。而且在寺庙和祭祀中对妇女有许多限制。宗教文化的传习也只限于男子,妇女被排除在外。

“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社会性别分析”(章立明载《佛学研究》2003年年刊)运用人类学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讨论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教义中的男洁女污的性别观念与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男贵女贱观念的结合,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并探讨了现今这一信仰与消除性别歧视之间的关系。

在傣族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相关研究中,基本上都是讨论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并存或两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孰重孰轻的关系。作为信仰主体,较少凸显,而有关女性与南传上座部佛教间关系的论述则更为少见。除了以上几篇论述外,“傣族稻作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初探”(王文光、方利敏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3期)以傣族社会的农耕稻作文化为结合点,挖掘出稻作文化背后所隐含的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因素。其中,以谷神“牙欢毫”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表明了傣族社会中曾经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傣族外,还有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佤族等全民或部分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但是,目前以上几个民族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相关论述极少,无法论及其中的社会性别理论的解读。

(3) 对藏族女性与藏传佛教的研究

在云南的滇西北地区,藏族、纳西族和普米族部分或大部分信仰藏传佛教。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云南藏族女性、纳西族女性、普米族女性与藏传佛教方面的相关研究。《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德吉卓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西藏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和出家女性及其组织、仪轨。对妇女信徒中的出家女性进行了深入考察,阐释了当今藏族女性的一种人生态观。这对藏族妇女信徒整个层面的理解和其他地区的藏族女性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借鉴和思考。

(4) 对少数民族女性与基督教的研究

基督教对云南少数民族某些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基督教三大派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中,云南少数民族信仰的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傣族、景颇族、

苗族、彝族、拉祜族、怒族、佤族、哈尼族等全部或部分的信仰。其中有关傣族、景颇族基督教的研究尤为突出。

一些著述、文章主要分析阐述了基督教信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原因和社会影响。如《云南境内的世界三大宗教——地域宗教比较研究》(杨学政、韩军学、李荣昆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钱宁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韩军学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可以说大多著述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即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的历史,其所呈现的社会功能,对当地社会的民族文字、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生活方式、民族道德、婚姻、家庭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然而直接从信仰主体上来讨论基督教信仰对当地社会性别制度的建构,女性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女性地位的变化在民族道德和现实生活方式上有何具体意义,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细微讨论和研究。

“云南怒江傣族妇女与宗教”(袁芳、杨国才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1期)阐述了在傣族社会中,无论是原始崇拜还是基督教信仰,都同样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这在原始崇拜中表现为诸多的禁忌排斥妇女们对宗教仪式和公众活动的参与。基督教的传入,向女性敞开了大门,女青年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参加宗教活动,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改善。但基督教中具有性别差异的教义与傣族社会中男权中心性别制度的结合,导致了女性地位依然不及男性,即傣族妇女可以参加宗教活动和教育,但不能成为神职人员。

(5) 对少数民族女性与道教的研究

对中国本土道教的研究中,由于其天然的阴阳二元思想,赋予了男女两性平等的观念,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如《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郭武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道教与密教中的女性崇拜”(李南载《南亚研究》1998年1期)将道教与密教(金刚乘)并置,挖掘两者内含的女性崇拜,指出道教与密教中的女性崇拜根源于人类漫长历史中母权制的存在,是先民对生殖繁衍和生存渴求的宗教反映的结论。“中国妇女与道教”(谷玛利载《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6期)从道教的“巫”出发,阐述了道教思想中的“重阴阳,等男女”思想对妇女信仰的影响,称中国妇女受其毒害。

“道教与女性研究述评”(陈云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1期)清晰的评论了中国道教女性研究的角度和思路。前人所作的成果,也大致揽入其中。然而具体到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女性与道教方面的相关研究则相对欠缺。

(6) 对回族女性与伊斯兰教的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中只有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学术界对

云南回族及伊斯兰教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于回族女性与伊斯兰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相关的专题研究,仅有部分零星的资料,如《圣洁的心灵:回族》(林艺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5年)中有对一些地区清真女寺、女子经堂教育的相关情况等的介绍。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白族、纳西族和傣族的研究日趋升温。在前人对民间宗教的相关研究中,大多研究依然专注于该民族宗教信仰的历史演进过程。重在本土崇拜的信仰起源、与儒释道的交融影响,以及宗教学和民族学学术上的定位与理论探讨等等。在一些著作中虽然不乏闪现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观点。但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解读,依然十分薄弱,以致没有形成专门的著述和文章。另一方面,民间宗教和原始宗教与人为宗教的紧密相连,表现为在民间宗教中的信仰主体的身份既连接着原始宗教的固有观念也暗合着人为宗教自身的性别观念。比如佛教讲究众生平等,而事实上女性应有的平等权、参与权、自主权和尊严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与其它民族交融的过程中,一些原始佛教的消极观念如“男尊女污”与中国传统文化或当地旧有的“男尊女卑”思想联合, (“略论佛教女性观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共相嬗变”杨孝容载《求索》2003年6期)造成女性身份的失落。比如在傣族社会中表现出的傣族女性既是某些祭祀的主体,又是被排斥在一些祭祀主体之外的矛盾现象。 (“傣族原始宗教研究的一个观点——傣族女性与原始宗教” (金少萍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3期)。

这也表明在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与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相关研究的讨论,是无法回避对这些人为宗教经典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别观念的解读。即,基督教既有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又有慈祥的圣母玛利亚,也有《新约圣经》中的福音书里体现出来的男女平等,对女性的关爱,还有《旧约圣经》中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认为女性是“不洁净的人”;伊斯兰教中的女子在早期的伊斯兰教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却被要求呆在家中,服从丈夫和家庭;道教的“重阴阳,等男女”思想,表现在宗教信仰中存在着大量女神、女仙,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概括的说来,在宗教与女性的研究范畴中,有三个主题需要探讨:经典与教义对女性的态度;女性在宗教组织中的地位;宗教对女性信徒的生活影响。^⑤而第一个主题的讨论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之后的两个主题。因此,在宗教与性别的研究中,不得不注重这方面的讨论。具体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仰,前人在梳理、讨论这些人为宗教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关联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作为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或立场,或者一种新的阐述思路,女性主义视角下社会性别理论的运用和分析是新兴而相对薄弱的。从社会性别概念出发,

阐释、解构人为宗教中固有的性别观念,进而实地调查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中的女性地位与现实生活,是非常必要的。

三、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禁忌与生命礼仪的研究

禁忌(Taboo)是宗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历来关注的重点。禁忌与宗教密不可分,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巨大作用,使得一些日常生活禁忌处处折射出宗教的影子,出现禁忌的礼仪化。有关禁忌、生命礼仪中女性研究的兴起表明了学术研究的细致化与深入性。

1、对少数民族女性与禁忌的研究

简单的说来,禁忌可以分为日常生活禁忌与宗教禁忌两类。而在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中,女性也往往被作为禁忌的对象。

《当代中国宗教禁忌》(朱越利主编 民族出版社 2001年)讨论了中国五大宗教禁忌的表现和特点。如德宏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中就有不能轻视妻子的教义,也有孕妇不能布施、修桥、建佛塔的行为。佛教密宗规定不能不尊重妇女,但是排斥寡妇、月经期的妇女在宗教场所逗留。道教的斋醮仪式中也排除经期妇女与孕妇。女丹修炼忌赤龙,即用法炼断月经,使之永不复再行。伊斯兰教中禁止和月经期妇女或产妇发生性关系。基督教中也有对经期妇女的禁忌,即不能接触她们。基督教同样重视婚姻,不主张离婚。

《禁忌与中国文化》(万建中著 人民出版社 2001年)探讨了中国文化中一系列的日常生活禁忌、商业百工禁忌、时空上的禁忌及禁忌的对象。女性被视为禁忌对象,主要的是她处于“不洁”的状态。主要是经期妇女、孕妇、寡妇。对她们的禁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诸多的禁忌,更多的在宗教仪式中,她们是被排除在外的。

宗教禁忌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更多的体现出一些禁忌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 (《宗教与民俗》刘稚、秦榕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禁忌无处不在,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女子的生育、生理。在宗教活动中,女性则直接成为禁忌的对象。而女性被视为禁忌主要的是基于生理上的月经,身份上的孕妇、寡妇。因此,正如前人所研究的,固有的宗教经典中对女性生理、身份的或不洁净、或模棱两可的原因而对她们排斥。同样,女性在现实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是矛盾的。一些学者对此也有了具体的阐述。如:“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禁忌”(金少萍载《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2期)以女性禁忌的现实分析出发,阐述了女性禁忌的“两面价值”的文化意义。并指

出了对待女性禁忌应该持有的态度以及男女平等的意义。“论中国少数民族的月经禁忌与女性民俗”(李金莲、朱双和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5期)则通过分析妇女月经这一生理现象的禁忌表现,阐述了这一特定身份下妇女受到的歧视与制约。

2、对少数民族女性与生命礼仪的研究

一个人的出生、成年、结婚、死亡是人生至为关键的几个重要阶段。每个民族都有着关于这些阶段的特定礼仪。对生命礼仪的研究历来都是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和民俗学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生命礼仪的研究,目前正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

“云南少数民族女子成年礼探微”(金少萍载《思想战线》1999年2期)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各种女子成年礼形式的描述,深刻挖掘出成年礼背后的文化内涵,并阐述了这一礼仪的现实变迁。文章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在人类学的视角下审视这一礼仪的重大文化隐喻,无疑是深刻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生命礼仪的研究有《中国少数民族礼仪》(张继焦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也有类似《藏传佛教民俗与信仰》(才让著 民族出版社1999年)、《宗教与民俗》(刘稚、秦榕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种概略性的民俗学角度的论述。如前所述,人的出生、成年、婚礼、葬礼体现着诸多的文化因素,而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生命礼仪的论述仅或多或少的分布在各类丛书、期刊中,而在人类学视野下的女性生命礼仪的阐述相当有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四、余论

学术界对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因其信仰类型的齐全和演变的特殊性,著述丰富。如本综述所表明,大量的原始崇拜至今依然存在且发挥作用。“白密”、东巴教的存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则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特殊形式。原始宗教、民间宗教与人为宗教的紧密相连,挑战着后来者的研究,也需要后来者有新的思路和视角。一方面,这样的研究无法脱离宗教概念下的崇拜对象、崇拜信念、崇拜活动和崇拜方式的旧有概念。尤其在人为宗教中,固有的性别观念的考察也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在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教研究中,尤其是原始宗教,势必要注重实地的田野调查,这既是人类学研究的法宝,也是评判前人资料是否可靠的重要标准之一。

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宗教与女性的相关研究,并形成一定的趋向。如《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高发元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对云南26个民族的女性现状作了描述,在某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女性的

作用和地位非常特别和重要,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关注宗教与女性的研究,这是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深化、精致化的表现。人类历史文化的创造是男女两性的共同活动,任何侧重于一方的研究都是有所缺憾的。因此,宗教学概念下的崇拜对象、崇拜信念、崇拜活动和崇拜方式的研究与女性人类学社会性别视角下男女两性观念的全面结合,势必开拓更为宽阔的研究视野,构建更为全面的学科理论。

(责任编辑:又小易)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重大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文化研究》(项目批号:06JJD850011)阶段性成果。

- ① 吕大吉、和志武主编《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
- ② 吕大吉、何耀华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白族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16页。
- ③ 李姝《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
- ④ 吕大吉、何耀华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基诺族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78页。
- ⑤ 吕大吉、何耀华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白族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56—780页。
- ⑥ 吕大吉、何耀华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彝族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 ⑦ 曾杰丽、韦宗协《壮族的女神信仰文化》,《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 ⑧ 赵捷著《永不安分的女魂:基诺族》,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页。
- ⑨ 吕大吉、和志武主编《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 ⑩ 吕大吉、和志武主编《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4—121页。
- ⑪ 吕大吉、何耀华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彝族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 ⑫ 于锦绣《简论原始宗教的形式、内容和分类》,《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
- ⑬ 罗阳《傣族的分布与宗教信仰的异同》,《思想战线》1998年第10期。
- ⑭ 董建中著《银苍玉洱间的神奇信仰——白族本主崇拜》,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62—65页。
- ⑮ 李贞德《最近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问题》,《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4年第2期。

ABSTRACTS IN ENGLISH

(Translated by Gantang)

Fake Dao Cultivates Xing, True Dao Cultivates Shen: Xing and Shen in *Xisheng Jing*

Li Gang

Xisheng Jing from West Jin argues that “fake Dao cultivates Xing, and true Dao cultivates Shen”. This argument has its own originality, that is to say, it separates Xing and Shen, and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ombination of Xing and Shen”, or cultivating Xing first and then Shen. Conception on Xing and Shen in *Xisheng Jing* do not completely deny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be immortality. Although it has some contradictions, we still believe that opens a new prospect regarding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life philosophy of Daoism.

Emperor Liangwu’s “Abandoning Daoism and Going back to Buddhism” in 504

Ding Hongqi

The imperial edict of “Abandoning Daoism and Going back to Buddhism” in 504 should be questioned. (1) It was not recorded in *Liangshu • Wudi Ji* (including *Nanshi*); (2) In early Liang Dynast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canonize Buddhism; (3) In early 504, Emperor Liangwu was unable to abandon Daoism absolutely. So, its authority was suspected, probably it was redacted by Buddhists to advocate their teaching during the time of Buddhism—Daoism controversy.

Changes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and the Rise of Border Service

Yang Tianhong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anged greatly: theological ethos of “social gospel” have been transmitted widely in the world of Europe and America, which made influence on the church of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ndigenous chur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n nationally church transcending denominations started to be constructed; the church changed the past ways to limit the regions of gospel transmission. All above contribute the rise of border service move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Yunnan Minority Women and Their Religious Studies

Jin Shaoping & Xu Weibin

As an ideology, religion implies the cultural gene of human history. Man and woman create the history together, and also create the culture. Recently, with the rise of social gender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e academe has exploited new theory for religious study, for example, woman and religion as a new trend in the research field. The present paper introduces the recent situation of Yunnan minority women and religion, and outline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